

刘桂荣  
著

# 西汉时期荀子思想接受研究

XI HAN SHI QI XUN ZI SI XIANG JIE SHOU YAN JIU

C13068620

B222.65

14

◎ 安徽师范大学项目培育基金 资助出版  
王大明 国学基金

# 西汉时期荀子思想接受研究

刘桂荣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76220

B222.65

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汉时期荀子思想接受研究/刘桂荣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5

ISBN 978 - 7 - 5650 - 1299 - 0

I. ①西… II. ①刘… III. ①荀况(前313—前238)—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2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4263 号

西汉时期荀子思想接受研究

刘桂荣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霍俊樟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印张	13.25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数	253 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5650 - 1299 - 0

定价: 3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节 荀子研究现状 .....	(1)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意义 .....	(12)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7)
<b>第一章 西汉荀子思想接受的发生学研究 .....</b>	<b>(21)</b>
第一节 汉初社会政治与思想 .....	(21)
第二节 儒学复兴 .....	(24)
第三节 荀子思想特点 .....	(28)
<b>第二章 陆贾对荀子思想的接受 .....</b>	<b>(37)</b>
第一节 陆贾的政治功绩 .....	(37)
第二节 陆贾对荀子天命思想的接受 .....	(42)
第三节 陆贾对荀子尊君和民思想的接受 .....	(51)
第四节 陆贾对荀子教化思想的接受 .....	(56)
<b>第三章 贾谊对荀子思想的接受 .....</b>	<b>(67)</b>
第一节 贾谊思想渊源 .....	(68)
第二节 贾谊对荀子礼法思想的接受 .....	(73)
第三节 贾谊对荀子民本思想的接受 .....	(85)
第四节 贾谊对荀子大一统主张的接受 .....	(93)

第四章 韩婴对荀子思想的接受 .....	(96)
第一节 韩婴及《韩诗外传》 .....	(97)
第二节 韩婴对荀子人性论思想的隐性接受 .....	(100)
第三节 韩婴对荀子礼法思想的接受 .....	(108)
第四节 韩婴对荀子诗言政形式的继承 .....	(113)
第五章 董仲舒对荀子思想的接受 .....	(121)
第一节 董仲舒对荀子天人思想的接受 .....	(121)
第二节 董仲舒对荀子人性论思想的接受 .....	(127)
第三节 董仲舒对荀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接受 .....	(132)
第四节 董仲舒对荀子逻辑思想的接受 .....	(143)
第六章 《乐记》、《礼记》对荀子思想的接受 .....	(150)
第一节 《乐记》对荀子思想的接受 .....	(150)
第二节 《大戴礼记》对荀子思想的接受 .....	(160)
第三节 《礼记》对荀子思想的接受 .....	(169)
第七章 西汉其他人对荀子思想的接受 .....	(177)
第一节 刘安《淮南子》 .....	(177)
第二节 司马迁《史记》 .....	(180)
第三节 扬雄《法言》 .....	(185)
结语 .....	(188)
参考书目 .....	(205)
后记 .....	(210)

## 结 论

### 第一节 荀子研究现状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生卒不详。荀子的事迹始见于《战国策·楚策》中“客说春申君”。《韩非子》有“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对荀子生平介绍最详细的是《史记》中《孟子荀卿列传》，后人多依其说：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以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机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区区两百余字对荀子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扼要概述。

荀子学说在当时地位非常高，时人评价他：

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德若尧禹，世少知之。<sup>①</sup>

汉代，刘向校讎《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

<sup>①</sup> 《荀子·尧问》。

篇，定著三十二篇”，并著《孙卿书录》：

孙卿，赵人，名况。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向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孙卿，乃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人或谓春申君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后客或谓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故贤者所在，君尊国安。今孙卿天下贤人，所去之国，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春申君恨，复固谢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孙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及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

孙卿之应聘于诸侯，见秦昭王，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至赵，与孙膑议兵赵孝成王前，孙膑为变诈之兵，孙卿以王兵能之，不能对也，卒不能用。孙卿道守礼义，行应绳墨，安贫贱。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孙卿后孟子百余年，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苏秦、张仪以邪道说诸侯，以大贵显，孙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进者，必不以其道亡。”

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孙卿卒不用于世，老于兰陵，疾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乎巫祝，信机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葬兰陵。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异同之辨，处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庐子、芋子，皆著书，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术，唯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孟子、孙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为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然世终莫能用，而六国之君残灭。秦国大乱，卒以亡。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呜呼，使斯人卒终于闾巷，而功业不得见于世。哀哉，可为震涕。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谨第录。

韩婴《韩诗外传》、桓宽《盐铁论》及应劭《风俗通义》亦载其事。

到了曹魏时期，徐幹有感于汉季的凌夷崩败，对荀子非常推崇，他说：

昔荀子生乎战国之际，而有睿哲之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明

拨乱之道。然而列国之君以为迂阔，不达时变，终莫之肯用也。<sup>①</sup>

唐代杨倞有感于荀子地位略为低落的现象，认为是荀书缺乏注解而乏人问津之故。他说：“《孟子》有赵氏《章句》，汉氏亦尝立博士，传习不绝，故今之君子，多好其书。独《荀子》未有注解……未知者谓异端不览，览者以脱误不终，所以荀氏之书，千载而未光焉。”于是，他立意为注，将刘向编订三十二篇予以整理，重新分章为二十之数，改《孙卿书》为《荀卿子》。他于序言中说：

仲尼定礼乐，作春秋；然后三代遗风弛而复张；而无时无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门人传述而已。陵夷至于战国，则孔氏之道几乎息矣；有志之士所为痛心疾首也。故孟轲阐于前，荀卿振其后。但其立言指事，根极理要，敷陈往古，掎挈当世，拨乱兴理，易于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又其书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也。盍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胶固王道，至深至备，虽春秋之四夷交侵，战国三纲弛绝，斯道竟不坠矣。

杨倞是千年以降第一个为《荀子》作注的学者。他对荀子颇为褒赞，在面对时人讥评荀子时，他刻意维护，认为：“荀子生于衰世，意在济时，故或论王道，或论霸道，或论强国，在时君所择，同归于治也。……故反经合义，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后亦尧舜之道也。”<sup>②</sup>

《荀卿子》书出同时，韩愈却评荀子为“大醇而小疵”<sup>③</sup>。“随着两宋愈演愈烈的‘孟子升格运动’，《荀子》一书的疵点由小变大，乃至无醇尽疵。因而由朱熹最终改造完成的孟轲顶替了颜回的‘亚圣’地位；以后荀况和《荀子》备

<sup>①</sup> 参见《中论·审大臣》。在《中论·原序》中，虽将孟子与荀子并列，但是对孟子却有所讽刺，而“深美颜回、荀卿之行”，将荀子与颜回并列，而颜回为七十子之首，孔子自叹不如，因此，实际上是将荀子置于孟子之上。

<sup>②</sup> 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sup>③</sup> 韩愈在《读荀子》中以荀子与扬雄为“大醇而小疵”，但非有贬抑之意，他说：“考其（荀子）辞，时若有不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雄之间乎”，也仅为说明《荀子》较之《孟子》要来得驳杂些，见韩愈撰、马通伯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他的《进学解》言：“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豫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这番感慨，虽为咏人以寄情，但也反映出荀子在其心目中地位之高，实与孟子难分伯仲，参见韩愈撰、马通伯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第27页。韩愈的“道统”论，才是后世尊孟抑荀的始作俑者。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儒道）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参见韩愈撰、马通伯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第10页。韩愈在追溯儒家道统之传承时，直以孟子承孔子，而荀子仅与扬雄同，不在传承之列。韩愈这一道统论，对后世儒者影响甚大，宋明理学家继承了他的衣钵，并以之为排拒荀子的理论依据之一。

受冷落，数百年里罕有学者论及”<sup>①</sup>。当然，其间也有学者为荀子申冤，针对苏轼《荀卿论》贬黜荀子，“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唐仲友《荀子序》便认为“卿老师，学者已众，二子适见世，昼寝铺啜，非师之过”<sup>②</sup>。司马光甚尊荀说，并有《疑孟》之作；对于韩愈将荀子置于孟子和扬雄之间，而有醇疵之议，认为“三子皆大贤，祖六艺而师孔子”<sup>③</sup>；为恐荀书浸废，他呈进《乞印行荀子扬子法言状》，呈请崇文院精校荀书，力图振兴荀学。

宋代理学诸儒批评荀子，往往跨不出苏轼的议论，罗织种种罪名，打压荀学；同时承继了韩愈的观点，将荀子摒除在道统之外，认为“大本已失”<sup>④</sup>、“全是申韩”<sup>⑤</sup>、好为异说<sup>⑥</sup>，认为李斯祸秦，荀子难辞其咎<sup>⑦</sup>。宋儒已掺杂佛老成分，不是醇儒，却每以醇儒自尊，抨击其他学人是叛道离经。宋儒的排他性，对荀子的拒斥，不是出于学术的需要，而是主观的好恶。宋儒另辟蹊径，理学兴起，儒学变质，因而在汉宋对立期间，与汉学有深厚渊源的荀学受到波及，乃是意料之中的事。此外，受自唐以降的疑经风气影响，在对抗中融合了佛老思想的理学，既是以心性论为对抗的主体，荀学自然不在论列；而在杂糅了佛道方法论之后，宋儒更致力于新学的开展，反向的荀学自更备受黜抑与鄙视。其三，改革后的新儒学摒弃了儒家原有的济世思想，从而走向体现个人的道路，荀书最终为一政治蓝图，失去其原有的注目，亦属必然<sup>⑧</sup>。

到了明代，理学在历经四五百年发展之后已显疲敝，加上其末流弊端丛生，一些有识的明儒开始反省理学，觉察到学术态度上的偏颇，从而采取更为公允的态度对待以前弃之如敝屣的“异说”，在这种背景下，荀学命运获得转机，最明显地体现在对各种“非荀”论的翻案。针对李斯罪及其师之说，陆粲在《注荀子序》中指出：“斯虽尝游其门，而卒叛去，乃用异说以残民，……其师善医，其弟子蓄蛊以杀人，非师之罪也。议者以斯故病卿，亦良过矣。”此语虽较前唐仲友未见高明，但也显见自宋至明之观念修正。就连力主排斥荀子孔庙配祀之列的宋濂，对此亦取同情态度：“李斯虽师卿，于卿之学懵乎未之有闻，先儒遂以为病，指卿为刚愎不逊、自许太过之人，则失之矣。”<sup>⑨</sup> 李贽也认为，“宋儒谓卿

<sup>①</sup> 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求索真文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sup>②</sup> 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例略》，中华书局1988年版。

<sup>③</sup> 《注扬子法言序》。

<sup>④</sup>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

<sup>⑤</sup> 《朱子语类·战国汉唐诸子》。

<sup>⑥</sup> 《荀卿论》（吕陶）。

<sup>⑦</sup> 苏轼、朱熹均持此论，韩元吉《荀子论》亦然，将焚书坑儒之罪归咎到荀子头上。

<sup>⑧</sup> 参见潘美月：《王先谦〈荀子集解〉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8页。

<sup>⑨</sup> 《宋文宪公全集·诸子辨》。

之学不醇，故一传于李斯，即有焚书坑儒之祸。夫弟子为恶而罪及师，有是理乎？”<sup>①</sup> 而孙淇澳则指出宋儒排荀虽力，而于功夫论上却得之于荀子：“荀子矫性为善，最深最辨，唐宋人虽未尝明述，而变化气质之说颇阴类之。”<sup>②</sup> 此论实发前人所未发。但整体而言，明儒虽对荀子抱有“同情”，仍不免有所訾议；虽有修正，眼界仍为宋儒所限。

清代，随着理学的崩解，在考据学带动的务实风气下，荀学得到复苏，也不再是争论时意气用事的焦点，而能真正了解荀学的意义与价值，从而赋予其更客观的学术地位，荀学得以在学术殿堂构架自己的体系。荀学不仅在诸子复兴间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为政治思想家们所重视，荀子也被当作汉学宗师来崇拜，正如梁启超所说：“汉代经师，不问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属变，壹皆盘旋荀子肘下。”<sup>③</sup> 清代学者大力揄扬荀子学术，实由汪中发其端。汪中将前人有关荀子的事迹考订的成果作了详细分析之后写成了《荀卿子通论》和《荀卿子年表》。他高度评价“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还说：“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传之，其揆一也。”<sup>④</sup> 对此，张舜徽认为：“顾儒学自有孟荀，道遂分而为二：孟主于尊德性，荀主于道学问。论其终旨，则孟子多卫道之语，荀子有传经之功……《荀子》三十二篇，多与两戴《礼记》相表里。”<sup>⑤</sup> 周予同先生也说：“在传经事业上，荀子也高于孟子。清朝汪中的《荀子通论》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我以为近于事实，汪中对荀子传经作了详细考证。秦汉儒生所学习的五经及其解说，大多本自荀子，是为经学史家们共同承认。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到荀子就作了综合。虽然在汉武帝以后封建王朝由于荀子主张不敬天地、否认命运、人性本恶诸说，不合愚民需要，因而将他本人摒于道统之外，遂使荀子在儒学的地位不及孟子显赫，并因此引起后人对荀子学说的种种误解；可是他实为孔子以后儒家的传经大师，实为战国末期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实为秦汉时期为封建专制的一统政权准备了理论基础的儒家先驱人物，则不能否定。”<sup>⑥</sup>

除了高度评价荀子，清代学者还加强了对《荀子》的整理，当时出现了一

① 《焚书·读史》。

② 《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二》。

③ 《清代学术概论》。

④ 《荀卿子通论》。

⑤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⑥ 周予同：《从孔子到孟荀》，《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25—826页。

批《荀子》的校注著作，据现代学者严灵峰整理所见《荀子》的研究书目，包括至今仍存或已佚者，在清代以前共有 41 部，而自清顺治元年（1644）到宣统三年（1911）间，即清儒研究《荀子》的书目，就有 48 部<sup>①</sup>。如果加上严氏未载的两种：惠栋《荀子微言》与汪中《荀子校本》，则有清一代荀书的研究著述至少有 50 种，其数量之多，竟高于清以前历代书目之总和，反映出清儒对荀书研究的盛况。其中有谢墉、卢文弨的《荀子笺校》，谢墉的《荀子校勘补遗》，刘台拱的《荀子补注》，郝鼓行的《荀子补注》，王念孙的《荀子杂志》，朱骏声的《荀子校评》，俞郴的《荀子评议》和《荀子诗说》等。清末王先谦总汇诸家校注，纂成《荀子集解》一书，这是最有影响的著作。这些对《荀子》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0 世纪初可以说是荀学研究的复兴更新期。刘师培用书证式考据方法整理《荀子》。他用毛左之说与荀书互证写成《荀子补释》，仿照《经传释词》和《古书疑义举例》发表《荀子词例举要》，网罗有关资料著成《荀子料补》和《荀子佚文辑补》，力图恢复《荀子》一书的原貌。在义理研究方面，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为“绌荀”派<sup>②</sup>，章太炎则是荀学研究中“尊荀”派的代表人物，他把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和荀子的天论结合起来，借助佛学的因明之术讨论荀子的名学主张，成为荀学研究由传统向近代更新承前启后的代表。

新文化运动逐渐开展起来之后，荀学研究进入全面展开的时期。《荀子》整理、荀学义理研究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梁启雄在 193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荀子柬释》，体现了精而能约、简而不陋的特点。就《荀子》部分字句的校注而言，主要出现了由钟泰所著、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出版的《荀注订补》，对杨倞以后各家有关注解进行了校正。于省吾在 1937 年出版《双剑簃〈荀子〉新证》一书，杂引旧籍，旁征古摘，以证成己说。叶玉麟的《白话译解〈荀子〉》1937 年由广益书局出版，对《荀子》的重要篇章进行了白话解读。义理研究方面，熊公哲的《荀卿学案》（商务印书馆，1931 年）较多地沿袭传统的书证式治荀方法，客观地发微荀子的旨趣。杨筠如的《荀子研究》（商务印书馆，1931 年）则立足中国文化着重探讨了荀子与中国古代哲学、宗教、政治、

<sup>①</sup> 据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中国荀子书目录》统计，详见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中正书局 1977 年版，第 3 册，第 31—117 页。

<sup>②</sup> 康门弟子之“绌荀”、“排荀”，乃是为扫荡传统政术流弊，推行大同之道和民权政治。说穿了，其“排荀”，排的不是荀子，而是清朝、古文经学，之所以以荀卿为排斥对象，乃是肯定汪中以荀子为传经之最有功之人。这种将己身的学术使命转嫁，用排除异己的手法，与当年的宋儒用非荀来抗拒汉学的手法，毫无二致。

经济各方面的关系，并评价了荀子学说的历史地位。刘子静的《荀子哲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38年）对荀学进行了综合分析。另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郭沫若、杜国庠、侯外庐等人对荀学义理进行了新的研究，促进了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sup>①</sup>。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大陆学者在海内外至少新出了荀学专著一百多部。其中，高正的《〈荀子〉版本源流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张觉的《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骆瑞鹤的《荀子补正》（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董治安与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齐鲁书社，1997年）、李生的《荀子校诂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文献整理类，以及李德永的《荀子：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夏甄陶的《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胡玉衡与李育安的《荀况思想研究》（增订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郭志坤的《荀学论稿》（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廖名春的《荀子新探》（文津出版社，1994年）、惠吉星的《荀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孔繁的《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马积高的《荀学源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韩德民的《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齐鲁书社，2001年）等义理阐释类著作较有价值<sup>②</sup>。

2005年以前荀子研究状况有江心力和廖名春的详细介绍，而之后这几年，荀子研究又有了新进展，下面特作具体介绍。一些出版社为了经济利益，纷纷出版各种形式的《荀子》译注，多是简单的现代文翻译，对象乃是中小学学生，这类以普通大众为对象的书籍对于《荀子》的文献整理并未起到促进作用。学术界新出的如下这几部书比较重要：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等人注译的《荀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以唐代杨倞注、清代嘉善谢氏校本为底本，吸收了王先谦、杨柳桥等人的研究成果，并参照北京大学1978年的《荀子新注》。王鹏整理的《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用唐代杨倞的注释，以浙江书局的《二十二子本》中《荀子注》为底本，删除注文中之校按语；对于清人特别是卢谢二人之校按语，确系精当处，则采入旁注；同时为了便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旁注中还增加了许多现当代学者的校勘和注释成果，主要采自王先谦之《荀子集解》、梁启雄之《荀子柬释》、李涤生之《荀子集释》、杨柳桥之《荀子诂译》及王天海之《荀子校释》，有点汇校本的样子。中华书局2011

① 参阅江心力：《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具体的分析可参阅廖名春：《20世纪后期大陆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邯郸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年出版了方勇、李波译注的《荀子》（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此书以《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为底本进行校对，每节分为“题解”、“正文”和“译文”。

综观这些年来所出版的《荀子》的注释、注译著作，连同之前的，尽管有四五十多部，但仍没有一部能与王先谦《荀子集解》比肩的注本。到现在为止，一百多年过去了，王先谦《荀子集解》仍是最好的注本。今天，深入研究《荀子》，我们迫切需要一部全面超过《荀子集解》的《荀子》新注。这部新注，首先需要选好底本，我们无论是选《古逸丛书》本还是南宋浙北刻本，都比所谓“不主一本，择善而从”要好，也比王先谦《荀子集解》选择卢校谢刻本为底本要好。高正、王天海推崇《古逸丛书》本而贬南宋浙北刻本；张觉尽管推崇南宋浙北刻本而贬《古逸丛书》本，但其《荀子译注》仍用《荀子集解》初刻本为底本，这是其《译注》的通俗性所致。浙北本虽残缺了十来页，但由于其为“今存《荀子》刻本之最古者”，文字错误较之《古逸丛书》本更少，当为上上之选。其次，要广为搜集前贤今人的解释考订成果，既要将《荀子集解》遗漏的前贤之说一一补齐，又要将《荀子集解》以后的今人之说尽可能地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不但要注意专书，更要重视单篇论文；不但要注意汉字文献，也要重视非汉字文献。第三，要在广集各家之说的基础上，考据与义理相结合，得出最后的考释意见，力争优胜劣汰，优选出或创造出最佳方案。21世纪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最应该做的就是这一工作。

在思想研究方面，出版了一些专著，继续从各个方面对《荀子》进行了研究。陈文洁的《荀子的辩说》（华夏出版社，2008年）认为，荀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的时代，在这种战争的背后，有一种更隐秘的“战争”，即诸子之间的激烈论争。从战国儒家的角度来看，论争主要表现为他们对其他学说的批驳。而荀子对诸子的批评更加广泛。由于其批评更具体且富于理性，因而更像是论辩（尤其对墨家）。在论辩中，他建立了一个低于儒家立场的价值平台，试图从这个非独断性的平台出发，通过一种更为对等的“讨论”，最终达成在观念上维护日渐衰落的传统生活方式（礼）的目的。荀子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再信任理想化的说教方式，不相信人们会出于对“善”的渴望而自愿服从“好”的生活原则。正是这种对现实人性颇具悲观色彩的理解，使得荀子认为：较之直接灌输“真理”，劝导或诱导是更为有效的方式。因此，不能将《荀子》一书理解为纯粹意义上的思想著作。这部作品具有劝说的性质，其著者特殊的写作目的，使得它不大可能是一部思想独白，而明显是一种辩说。

吴树勤研究认为，人学问题的讨论贯穿荀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他立足礼学的视野，以“知通统类”为核心，对荀子的人学思想作了系统的动态的分析。《礼

学视野中的荀子人学——以“知通统类”为核心》(齐鲁书社,2007年)一书主要从荀子人学思想的自然观根据、人性论根据、个体道德人格的培养、个人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和理想人格的成就等五个方面,对荀子的人学思想体系作了具体阐述;从天人之分、人性的结构性分析和人格修养功夫等方面,对荀子人学思想中的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人之安身立命的基础、人之价值如何实现等问题作了扼要的梳理,力图按照荀子的本意把人作整体的、动态的展示,以此透视出富有特色的荀子人学思想的儒学性质。

王军的《荀子思想研究:礼乐重构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则认为荀子思想是围绕“礼乐重构”主题展开的:“天人之学”和“人性之论”乃其理论奠基;“宽猛相济”和“崇礼兴乐”是其制度设计;“王霸之途”和“理国之道”乃其思想关切。在此人文思想演绎进程中,荀子坚持了中国儒家人文主义基本立场,同时亦采取了通权达变之方略举措;荀子的认识论与逻辑学亦乃其礼乐思想重构之衍生品。故而,若要通透理解荀子思想之所谓“矛盾”,亦须从“礼乐重构”主题入手;评价荀子亦然:荀子并非习俗所云“先秦思想之集大成者”,而是站在儒家立场上的“先秦思想总结者”。

北京社科院的孙伟的《重塑儒家之道》(人民出版社,2010年)试图对荀子思想进行再考察。全书共分5个章节,主要对荀子思想作了再一次的探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荀子的儒家身份、儒家人性论问题及荀子的解决方案、儒家的政治教义与荀子的贡献等。全书共20万字,主要通过对荀子哲学与道家哲学以及法家思想的比较,解释荀子如何通过综合采用其他学派的观点发展了孔子和孟子的道德、社会以及政治哲学。荀子在战国晚期解决儒家思想问题的策略,比如说礼和法,为当代世界塑造儒家社会提供了重要范式。尽管当前世界局势已大大迥异于荀子所生活的时代,但荀子所提出的塑造或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为当前仍然被局部战争和冲突所困扰的世界建立良好的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另外,儒家所遭遇的问题并不是在战国后期这一特定时期才发生的。这些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儒家的道德和政治理想,这些理想本身对民众来说依然非常有吸引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这些理想的手段和方式。无论是在战国后期还是在以后的时代,实现儒家理想的方式问题将长久存在。因此,对荀子及其以前的儒家人物实现儒家理想的方式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将具有重要意义,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为什么后来的历代王朝会遵循荀子所提出的统治方略。在这个意义上,该书也对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王楷的《天然与修为——荀子道德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将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的视角引入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之中,对荀子的伦理思想作了一种新的修身哲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该书以道德的可能性

问题、道德观念的结构和关系问题以及道德修养实践问题为中心线索，细致分析了荀子伦理思想的理论特质，并进而呈现出荀子学说作为早期儒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典范这一思想史意义。在传统儒学史观的背景下，荀子思想被归结为政治整合层面的外王之学。因此传统的荀学研究往往倾向于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展开阐释，而对荀子以道德人格为中心关切的修身学说未能给予应有的理论重视。

林宏星编写的《〈荀子〉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分析了《荀子》一书中的重要理论和概念，并在分析过程中将这些理论和概念与作者眼力所及的海内外学者之相关研究以及国外重要哲学思想进行对比，阐发荀子思想精微，以期读者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乃至中国文化有所熏习和激发。

据中文期刊网搜索，自2006年至今，新发表关于荀子研究的学术论文近1200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22篇、硕士学位论文131篇、学术会议论文35篇，分别对荀子的礼法制度伦理、天人观念、人性论、政治哲学、道德修养理论、和谐思想、音乐思想、生态伦理思想、管理思想等等进行了阐释，并对荀子与孔子、思孟学派之间的不同进行了比较。

由于荀子性恶论的价值立场以及极强的理性色彩与西方文化有某种契合之处，西方世界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荀子研究，著述颇丰，胡可涛根据T. C. Kline III与Philip J. Ivanhoe主编的《〈荀子〉中的美德、自然与道德主体性》统计显示，西方世界有荀子研究论著18部、相关论文57篇。而据台湾学者王灵康不完全统计，相关著作及论文有119部（篇）。国外最早的荀子研究出现在英国，之后，法国、德国亦有出现研究论文。英国和美国对荀子的研究较欧洲更为深入。西方对荀子哲学思想研究的共同点是：研究方式主要有文本转换（翻译）和思想诠释（有D. C. Lau、Wing-tist Chan等的“内在研究进路”和Dubs、Herrlee G. Creel、Donald Munro等汉学家的“外在研究进路”）；在研究方法上，广泛运用西方的哲学分析法和比较法。8世纪左右，《荀子》传入日本，18世纪达到研究高潮，日本的荀学研究最初是侧重考据注疏，后转向“义理阐释”，并使用西方哲学方法。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日本研究荀子的黄金时代，荀子研究向纵深和多元化方向发展，尤其重视微观研究，并从思想特色研究转向思想来源研究。韩国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至今有关荀子的专著、文章及博士、硕士论文多达一百多篇<sup>①</sup>。

台湾亦有多个研究学习荀子的学会和学者的著述不断问世。据蔡锦昌分析，

<sup>①</sup> 王灵康：《英语世界的荀子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2003年第11期。

五十多年来台湾荀学之特色，除了基本上延续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以来荀子被认为是以旧传统中比较接近西方现代科学典范的重要思想家以外，研究荀子的另一种新意涵就是补孟子内圣学之不足，亦即港台新儒家所谓“开出外王之学”。蔡锦昌认为，台湾的荀子研究者“可分为七类：其一是这五十年来提供荀子读法和解法之大纲领的荀学大老，其中以牟宗三和陈大齐最先出书且最重要（牟宗三：《荀学大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年；今收在牟氏著：《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再版，第191—277页。陈大齐：《孟子性善说与荀子性恶说的比较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年。以及《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徐复观、韦政通、劳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劳思光：《中国哲学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1968年）。其二是这些老师们的弟子，其中又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涤生、周群振等比较突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发扬师说（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学生，1984年；李涤生：《荀子集释》，台北：学生，1979年；周群振：《荀子思想研究》，台北：文津，1987年）。其三是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龙宇纯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师熊公哲，他们的格调比较近于传统训诂之学。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战后之‘新西学’（包括有现象学、诠释学、语言理论、社会理论、新史学等）来讲论荀子义理的台大中文系老师张亨（张亨：《荀子对人的认知及其问题》，《文史哲学报》第二十期，1971年，第175—217页；《荀子礼法思想试论》，《台大中文学报》第二期，1988年，第69—102页。其中前一文大胆借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架构来解释荀子的天人关系，后一文更像哲学研究所的社会哲学论文，大量引借西方哲学文献来比论）。其五是辈分较低的大学老师，他们为了升等为教授或副教授而写了关于荀子的论文，而且基本上借用或混用了以上四类老师辈所提供的论法，其中只有本文作者的论法不但自创，而且跟所有台湾荀子研究者的取径相反（拙著《从中国古代思考方式论较荀子思想之本色》[台北：唐山出版社，1989年]即是为升等副教授所写的论文。此书后来再版时改名为《拿捏分寸的思考：荀子与古代思想新论》[台北：唐山出版社，1996年]，其真正的意图在于以‘阴阳五行’的‘气’的思考方式来连通关于先秦诸子的读法，而且以此作为重新确立中文事物本色的先行范例）。其六是近十年来有著作输入台湾的一些大陆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荀子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初版）、马积高（《荀学源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等。其七是少数有著作被翻译为中文的欧美学者，如柯雄文等（柯雄文著，赖显邦译，《伦理论辩：荀子道德认识论之研究》，台北：黎明文化有限公司，1990年）”。另外，“硕士论文已

有四十多篇，博士论文的总数也将累增至接近十篇。这些学位论文所讨论的主题大概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现代西方人文社会学科之学科分界为准所分划出来的主题，如‘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经济思想’、‘荀子的教育思想’、‘荀子的知识论’、‘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学思想’等等；一类是荀子文献中的重要用语和主张，如‘化性起伪’、‘统类’、‘礼’、‘心’、‘天’、‘正名’、‘性恶’、‘非十二子’、‘法后王’等等<sup>①</sup>。

目前学界从多个角度去探讨荀子思想，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虽然研究视角有所转换，研究方法有一定突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从近几年发表的研究论文看，探讨问题的侧重点仍在天人观、人性论、认识论等一些方面，选题重复。这些都制约着荀子研究的发展。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意义

荀子思想丰富深厚，他是我国先秦儒家集大成者。荀子对先秦的思想文化作了综合的批判与总结，对于形成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和格局，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承，作出了仅次于孔子的历史性贡献。两汉时期，社会政教之大势遵循着荀学的理路，许多士人对荀子褒奖有加，并批判继承荀子思想以成己论。

就荀子与西汉学术界的关系，史上曾有人提及，如以汪中为代表的清代学人对荀子的传经之功多有断语，但学界至今仍多引用此论，而很少进行具体论证与辨析。上世纪30年代，杨筠如、梁启超、张西堂等就《荀子》与《韩诗外传》、《礼记》的关系展开过热烈讨论，其中，张西堂《荀子真伪考》专门讨论《韩诗外传》、《礼记》与《荀子》的关系，然该著偏重从语言特点角度论证《韩诗外传》、《礼记》摘抄于《荀子》，并未把这一摘抄现象纳入西汉政治史、教育史、学术史中探讨其缘由与意义。马积高的《荀学源流》对于研究荀子思想在后世的流传有开创之功，但言之简略，多未展开。徐平章的《荀子与两汉儒学》注重显性联系层面的研究，对于隐性接受没有考察，也未能在时代语境和学术史变迁当中研究接受的意义。郭志坤的《浅说荀子及其荀学之浮沉》曾简略提及，但该论文未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台湾阎隆庭的硕士学位论文《大小戴记与荀子关系之探索》研究《礼记》与《荀子》之关系，对于它们文字相同、相似

<sup>①</sup> 蔡锦昌：《五十年来台湾地区的荀学研究》，《中国思想史通讯》2006年第1辑。